

一个跳高教练的生涯

作者：杨文永

(上接本报8月17日第B4版)

4、从业余走向专业

能幸运地留在上海，而且还是在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单位上班，我焦虑不安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原以为我可以安心地去训练了，但爸爸的病情却日益恶化。父亲的肝癌发展到了晚期，腹部胀得很大，而且肝区剧烈疼痛，使他呻吟不已。家里所有的人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着他的病情朝着无望的方向发展，心疼不已却又无能为力。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因医治无效，父亲不幸逝世，享年四十八岁。父亲的英年早逝，让母亲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只能尽量多留在她的身边陪伴她。妈妈的记忆力很好，能记住过去点点滴滴的经历。坐在她身边时，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年青时的往事。例如：她的婚礼当时是如何的风光，轰动泉州市，以及嫁到杨家以后，大家庭内的种种传闻轶事、矛盾等；不过更多的是讲在抗战期间，她如何只身带着四个幼儿几经周折脱离了大家庭，来到了上海与爸爸团聚的故事。回忆往事，常常会让她忘却了丧夫之痛。因而陪伴在她的身边，听她讲自己的故事，就是医治她悲痛的良药。

爸爸的去逝使家庭的经济一下子蒙上了阴影。此时姐姐已经结婚，我变成了家中唯一有收入的人。当时上海市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工资为六十五元五角。我们单位第三工程局是华东区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属于华东区，而不归上海市管辖。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华东区各省市，他们的家属也几乎都在外地，所以有额外的补助，如：伙食、房租等等。我的工资也因此随着水涨船高，月薪七十九元五角。我自己留下九元五角作为零用，其余全部交给妈妈。即使这样，仍不够一家五口人的日常支出。为了节省开支增加收入，妈妈邀请姐姐、姐夫搬来与我们同住。我家只有二间房，一间小的约十四平方米，让姐姐一家人住；另外一间大的，约二十八平方米，我们五个人（妈妈、我和三个妹妹）挤着住。姐夫早年丧母，结婚前他的爸爸也去世了。他人很好，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所以尽管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很困难，但有了姐姐、姐夫无私的资助，一家人相对而言勉强过得去。

家里变化这么大，加上平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每天都必须上八小时的班，所以我每周最多只能在星期天的上午去一次风雨操场，跟着吴教练进行训练。一周只训练一次，对于具有全国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那实在是太少了。一九五七年

的春天，室外比赛却不少。吴指导要求我尽可能地去参加每一次比赛。此外，吴指导还从其他的大学和单位召集了不少有一定水平的业余运动员，组成了上海田径队，去外地参加全国比赛。上海市体育学院的黄兆椿被请来当助教，他是当时上海跑得最快的运动员，主攻一百米、二百米以及四百米接力。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吴天池也被请了来，他人高腿长（身高约有一米八十四），是位很有天赋的四百米、八百米运动员。国家队也相中了吴，想把他调去作进一步培养。可不幸的是，当年的下半年在“反右”的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遣送去安徽劳动改造。听说为了生活，他常常靠卖血来养家糊口。吴本来就瘦，受此打击与折磨，人变得更加瘦骨嶙峋。平反之后，他回到音乐学院，在录音室工作，负责CD的制作及现场的录音。我从小酷爱听古典音乐，所以自从他回上海之后，就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后来他的学生告诉我，他六十九岁时逝世了。我为他既感到惋惜，又深感悲哀——这么一位有能力、充满朝气又有灵气的好运动员，就因为政治运动而耽搁了！我常常想：如果他不被打成右派，那么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他会破全国记录，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中长跑教练；或是成为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他在音乐学院学的是作曲专业）。他本来有一位既漂亮又活泼的女朋友，也是业余田径队的队员，就因为他成了右派而不得不与他分手。平反后他一直对此事难以释怀，后半生忧郁不得志。我为他感到痛心，感叹在政治风波面前，人的命运如蝼蚁一般啊！其他被吴指导招来的还有复旦大学的学生张士雄，张是一百一十米栏运动员。另外还有一位名叫陈锦华，我对他印象很深，他是上海市耀华玻璃厂的工人，也是四百米赛跑的运动员。陈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实在，坦率，爱讲话。跑四百米应该在起跑之后留有余地，根据自己的实力和训练水平，合理地分配跑的节奏，这样才不会在最后的阶段因为体力不支而被对手超越。可他不管这些，说：“枪声一响我就用全力去跑，前二百米我领先了，就能得到观众的掌声，至于后来被人赶上也值得，否则我得不到观众的欣赏。”难怪他从未拿到过好名次！不过他的这一招常常破坏了对手的节奏，而让同场比赛的队友吴天池顺利拿到冠军。

我们这些业余的伙伴们，因为有着相同的背景，所以相处得很融洽。每次比赛时，不像专业队的队员们那么紧张怕输，而是更关心竞赛过程中带来的



▲ 进体工队前与上海高校田径队赴南京比赛合影

乐趣。在那个阶段，我们去不少地方，如：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等等。最远的一次从上海搭乘长江的客轮，逆流而上驶往重庆，沿途经过南京、安庆、武汉、万县。我们无拘无束，每停靠一站都要下船，游玩附近的景点。初去万县时才真正体会到为何四川被誉为中国的天府之国。记得当时体委发给我们每天的伙食标准为伍元人民币。抵达万县时刚好是吃午餐的时刻，船停靠在码头的时约有三小时。于是我们十几位队员乘机下船吃午饭，只见码头上人山人海，行人摩肩接踵，沿街的小贩们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时值广柑丰收的季节，上前一问，一角人民币可买到十个既新鲜又甜的广柑！进了饭店，服务员热情地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年轻“贵宾”。那是我首次品尝到地地道道的四川菜，真的是每道菜都是美味佳肴，而且价格便宜。记得最清楚的一道菜是“芙蓉鸡”，它是把整只童子鸡拔毛洗净后，放入鸡蛋面糊内浸透，然后放在油里炸。此道菜不仅香味扑鼻，而且入口清脆，好吃极了！吃饱后口袋内还有剩钱，于是我们就四处逛街，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才满载回船。

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是我当运动员最高兴的时刻。虽然短暂，却使我难以忘怀。那时的比赛不少，但我的比赛成绩却一直停留在一米八的水平。这也不奇怪，我的训练不仅不系统，而且很少——一周最多一次，有时还缺席。这样的训练哪能出好成绩？我已记不清楚我究竟连续跳了几次一米八。于是业余队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老白虱”。这三个字，按上海话解释应为：老=总

是，白虱=八十。我听到之后既不恼火，也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比赛时所表现的成绩，就是你平时训练的结果。那时一米八的成绩，在全国比赛一般都是前六名的水平。作为一名业余队的队员，能为上海队争取到名次已经很不错了。我既没有包袱，也没压力，这是业余训练的一大特点。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的某天上午，人事科的安科长找我谈话：“公路总局决定撤销第三工程局在上海的办事处。我们决定把你与总工程师安排去北京总设计院工作。”他还加了一句：“全局只有你和这位总工程师有幸被分配去北京总设计院，其他人全都分配回原籍。这是个好机会，你应该尽快去北京报到。”这可真是个好消息！能去北京总设计院工作当然好，但我爸爸刚去世不久，妈妈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我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家人，她们一致希望我能继续留在上海。想了很久后，我决定给体委人事科的钱梦月打电话。次日，她把上级的决定告诉我：“体委想把你调入专业队。一旦你退役了，再重新为你找对口的工作。”我认真地想了一下：我还不到二十二岁，在跳高上仍有提高的潜力。哪怕专心训练五年后没有大的成果，那时我也才二十六岁，再去搞桥梁工作也不算太老。综合家庭情况，我决定接受体委的建议，不过我还是跟体委重申：一旦退役了，体委必须让我回去搞本行的工作（桥梁与隧道）。钱梦月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被正式调入了专业队。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